

新闻春秋

『中国红色新闻事业的理论与实践
(1921年—1949年)』 高层论坛



新闻春秋

『中国红色新闻事业的理论与实践
(1921年—1949年)』 高层论坛

论文汇编



江西高校出版社

【第十一辑】



“红色新闻高层论坛”开幕式现场
(单盼峰摄)



“红色新闻高层论坛”与会人员听取嘉宾演讲
(单盼峰摄)



赵玉明教授（前右）和陈信凌教授（前左）出席“红色新闻高层论坛”小组研讨会



丁淦林教授在“红色新闻高层论坛”小组研讨会上作精彩点评

《新闻春秋》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任 方汉奇

主 任 赵玉明

常务副主任 程曼丽

副主任（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俊杰 尹韵公 吴廷俊 张 昆 陈昌凤

陈培爱 秦绍德 黄 瑚 蔡铭泽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俊杰 马 艺 王大龙 王 醒 尹韵公

乔云霞 刘 亚 李 文 李 彬 李 磊

李润波 杨海军 吴廷俊 张 昆 陈昌凤

陈培爱 郑亚楠 郑德金 单 波 赵玉明

秦绍德 徐新平 郭镇之 黄 瑚 商娜红

程曼丽 曾宪明 雷跃捷 蔡铭泽



目 录

CONTENTS

第一部分 特邀嘉宾演讲

- 南昌大学副校长傅克刚在开幕式上的讲话…………… (2)
- 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赵玉明在开幕式上的讲话…………… (4)

第二部分 中央(江西)苏区新闻事业研究

- 江西苏区标语的传播学分析…………… 陈信凌(8)
- 中央苏区时期报刊发行的途径与效果研究…………… 陈志强 吴廷俊(14)
- 《红星报》发刊词《见面话》的理论价值初探…………… 刘 亚(22)
- 红中社参考刊物《无线电日讯》的历史研究…………… 万京华(29)

第三部分 红色中华新闻台研究

新中国广播通讯事业的前身

-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红色中华新闻台历史考证…………… 严 帆(34)
- 苏区时期的人民广播事业…………… 刘卫国 刘照龙(39)
- 瑞金是中国人民广播事业的发源地…………… 胡江银(44)
- 关于红色中华通讯社新闻广播和新闻台的历史含义…………… 郑德金(49)
- 关于人民广播事业发源于江西苏区说之商榷…………… 庞 亮(57)

第四部分 延安时期红色新闻事业研究

-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宣传功能的传播学解读…………… 郑 萍(62)
- 试析延安(陕北)台的宣传技巧…………… 贾临清(65)
- 延安《解放日报》的批评性报道…………… 李 文 李宇红(69)
- 党性要求、话语表达和体制安排
- 延安《解放日报》改版意义探析…………… 许加彪 张 媛(78)

第五部分 红色新闻事业专题研究

- 武汉会战时期的周恩来与抗战宣传…………… 吴廷俊 陈志强(84)
- 从周恩来为新闻事业的题词管窥周恩来的新闻思想…………… 刘书峰(96)
- 中国红色报刊的开拓者瞿秋白…………… 乔云霞(99)

工农通讯写作：“全党办报”的缩影

- 以延安《解放日报·新闻通讯》为中心的考察 李秀云(106)
- 《右江日报》和《右江报》沿革 摘自右江日报志(111)

红色广播重镇

- 简述解放战争中河北人民广播事业 刘莹(114)
- 略论解放前共产党报刊的体育报道 薛文婷(119)
- 延安时期新闻传播事业红色旅游中的地位与发展策略
..... 张羽 刘妮(126)

第六部分 部分课题研究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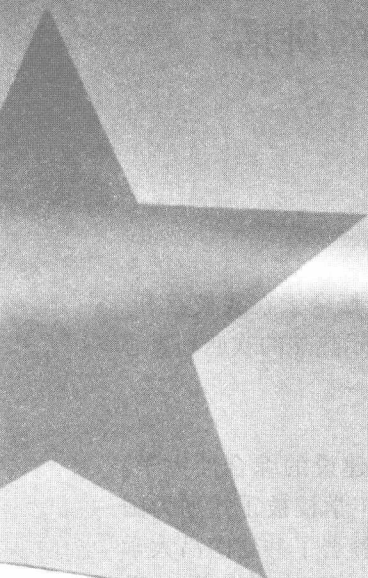
- 中国红色新闻法制发展史略 倪延年(132)
- 唐山新华广播历史研究 中国广播电视史研究委员会唐山课题组(144)
- 抗战的喉舌与号角
——新四军及华中抗日根据地报刊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课题组(150)
- 延安时期的新闻事业
——《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新闻事业发展》课题综合报告
..... 阮观荣 郑德金等(182)
- 中国红军《红星报》的非新闻业务 王卫明(195)

第七部分 红色新闻事业概貌研究

- 红色出版物编辑出版情况综述 胡丹(200)
- 论革命战争年代我党传媒业在不同媒介环境中的实践与经验
..... 曾宪明(208)

附录

- 新闻媒体对高层论坛的部分报道 (213)
- 后记 (215)
- 编后记 (217)



第一部分

特邀嘉宾演讲



南昌大学副校长傅克刚在开幕式上的讲话

(2008年4月19日)

各位专家、各位来宾：

上午好！

在这春意盎然的季节，“中国红色新闻事业的理论与实践”高层论坛今天在我校召开。在此，我谨代表南昌大学党委和行政，向来自国内外的全体与会代表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借此机会，请允许我对我校的基本情况作一介绍。

南昌大学是我省唯一一所实行省部共建的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的综合性大学。1993年5月4日，由原江西大学和江西工业大学合并组建而成，1997年学校被正式列为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2004年12月，教育部和江西省人民政府签署了共建南昌大学协议。2005年8月24日，经教育部批准，南昌大学与江西医学院正式组建新南昌大学，使学校又步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学校现有青山湖、东湖、前湖、鄱阳湖、抚州5个校区，占地面积8098亩（其中前湖校区4400余亩）。拥有文、史、哲、经、管、法、理、工、农、医、教育等11个学科门类的91个本科专业，各类在校生8.1万余人，其中全日制本、专科生近7万人，校本部全日制本科生3.7万余人，各类研究生8000人，留学生126人。现有博士学位授予点25个（其中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硕士点175个（其中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点20个）、博士后流动站4个。

学校现有专任教师2413人，其中副高以上职称人员1083人，占44.9%。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406人，具有硕士以上学位的教师1371人。

近年来，学校十分重视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与建设，出台了一些有利于人文社科繁荣发展的政策措施，极大地促进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人文社会科学教研人员获取科研项目及经费的能力大大增强。

南昌大学新闻学专业创办于1958年，是1949年以后国内成立最早的三个新闻专业之一，在过去50年的办学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由教育部高教司主办的“韬奋新苗奖”，只在1994~1998年举办了四届，我校推荐的学生年年全部获奖，而且每年至少一个一等奖，这个成绩在全国高校的新闻院系中非常突出，在省办院校中首屈一指。

2005年，我校学生参加由教育部高教司主办的第一届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总共获得20项奖励，其中包括本次大赛唯一一个影视类金奖。

2007年，我校学生参加第二届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获金奖两项、三等奖5项，优秀奖30项，总成绩排全国高校第二。

中国广告学会学院奖是面向全国大学生的权威性的比赛，台湾中国时报广告金犊奖是面向全球华人地区规模最大的学生广告活动，这两个奖项现在定期举办，我校每次都推选学生参赛，获得奖励数十项，其中有中国广告协会银奖（当年金奖空缺）和最佳公益广告奖各一



项。

2004年,我校与中央电视台合作,在新闻系设立中央电视台“挑战主持人”栏目人才选拔基地,江西和福建两省的选手要参加“挑战主持人”的比赛,都由这个基地推选。2004年5月,新闻系推荐了3位学生到中央电视台参加“挑战主持人”栏目的现场比赛,最终,有两位学生分别获得第25期和26期节目的现场冠军。

学生屡屡获奖,给南昌大学新闻系带来了很大的荣誉:在一份由中国科学评价中心公布的国内高校各专业排名的材料中(见《科学时报》2006年5月15日第7版),南昌大学的新闻学专业名列全国第六。

江西是著名的革命老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升起的地方,是中国革命的摇篮和人民共和国的摇篮,也是中国红色新闻事业的一个集中地。

基于这个地理优势,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积极开展“中国红色新闻事业”的研究,并已取得一批研究成果,获准立项1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名称为“江西苏区新闻事业研究”)、1个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名称为“江西苏区重点报刊研究”)。

今天,各位在这里召开“中国红色新闻事业的理论与实践”高层论坛,这是中国红色新闻事业研究界的一次盛会,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学习交流机会,必将对南昌大学以及新闻与传播学系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相信这一场关于“红色新闻事业的理论与实践”的高端对话,必将推动中国革命史、新闻史的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并对当今中国新闻事业和“红色旅游”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最后,祝各位专家、各位来宾心情愉快、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合家幸福!祝本次论坛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傅志刚

2008年4月19日



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赵玉明在开幕式上的讲话

(2008年4月19日)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老师同学们：

“中国红色新闻事业的理论与实践”高层论坛今天在南昌大学举行。这次论坛是由中国新闻史学会、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电视史研究委员会、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和苏区新闻研究所联合主办的。我谨代表中国新闻史学会、中广协会广电史研委会对论坛的举行表示热烈的祝贺，预祝论坛圆满成功！

江西是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所在地，南昌是周恩来同志领导的“八一”起义的纪念地。南昌大学是江西省重点 211 大学，南昌大学的新闻与传播学系创办于 1958 年，是中国成立较早的新闻系之一，经过 50 多年的发展，已是江西省有代表性的新闻院系。江西是我党创办的系列“红”字号新闻事业（红色中华报、红色中华通讯社、红色中华新闻台、红星报）的创办地，江西大学的苏区新闻研究所是全国唯一的从事红色新闻事业的研究机构。在红色新闻事业的创办地召开红色新闻事业理论与实践的高层论坛，又有这么多的红色新闻事业的研究者和关注者相聚一堂，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万事俱备，相信本次论坛必将为进一步丰富和充实中国现代新闻史的内涵做出贡献。南昌大学的新闻与传播学系和苏区新闻研究所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为筹办此次高层论坛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我代表两会和与会代表，谨致以衷心的感谢，同时对来自全国各地兄弟新闻院系和有关新闻研究单位的同志们表示欢迎！

中国新闻史学会是我国目前新闻传播学方面唯一的国家级学术社团，是以高校新闻院系从事中外新闻传播史（广义）教研人员为主，兼及新闻业界新闻传播史研究人员组成的，1989 年春成立，首届会长方汉奇教授，目前是第三届，明年将换届。成立以来的活动请见会上分发给同志们的中国新闻史学会介绍材料。广电史研委会是中广协会所属 40 余个二级学会之一，成立于 1987 年春天，首任会长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原台长杨兆麟同志。今年将换届，成立以来已举办过七次全国广播电视史志研讨会。近年来两会与有关单位合作于去年在复旦大学举办了第二次地方新闻史志研讨会，今年二月在北京大学举办了“周恩来与新闻工作座谈会”，本次论坛也是两会合作召开的研讨会之一。今明两年，两会将合作或分别与其他单位举办的研讨会还有新闻改革开放三十年研讨会，6 月将在复旦大学举办：中国新闻教育和研究 90 周年纪念活动，10 月间将在北京大学举办；11 月间，“刘少奇与新闻工作座谈会”；11 月，首届两岸三地媒介批评史论学术研讨会；明年将在新加坡举行第六届世界华文传媒与华夏文明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范长江新闻思想研讨会，第八次全国广播电视史志研讨会，中国新闻史学会换届及成立 20 周年纪念活动等。上述学术活动欢迎与会专家、学者、老师同学们参加，共襄盛举，推动中外新闻传播史的研究深入开展。

举办本次论坛的目的，在邀请函中已有明确要求，概括起来是四句话 16 个字，即追本溯源、发掘传统、个案研究、理论探究。根据自己从事新闻史、广电史近 50 年来的研究实践和体会，拟就上述几个方面，谈谈个人的认识，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第一，中国红色新闻事业追本溯源，首先是上世纪 20 年代初红色报刊，然后有 30 年代



初红色中华通讯社(即新华社),最后是40年代初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其中,新华社的历史在50年代确定的创建纪念日是1937年1月,在1957年还举行过20周年纪念活动。改革开放后,经调查研究,确认新华社的历史从江西瑞金红色中华通讯社算起,创建纪念日改为1937年11月7日。关于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文革”前的创建纪念日是1945年9月5日,1965年举行过20周年纪念活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都题词嘉勉。改革开放后,经调查研究后,报请中宣部批准,从1980年起改定创建纪念日为1940年12月30日。这两件更改纪念日之事都说明追本溯源四个字是有过程的,以我亲身经历的更改人民广播创建纪念日一事,从70年代初发现延安台于1940年12月30日开播,到80年代初更改纪念日,前后历时10年,这中间还有一个解放思想的经历。试想如果不是解放思想,毛主席题词的纪念日,你要提出更改,一是你也不敢,二是上级也不会答应。但由于有党的“一大”召开时间考证的结果在先(原来大家都以为党的生日是7月1日,因为“一大”是1921年7月1日开幕的。其实不然,党的“一大”召开是1921年7月23日),又有新华社更改纪念日之事在后,人民广播创建纪念日的更改才有可能。

那么追本溯源,红色报刊是始于何时呢?据我所知,学界和业界见解并不一致。从本次论坛通知看,认为是1921年,换句话说也可能就是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办的报刊算起,但党成立当时,并未创办机关刊物,只是将原来的《新青年》作为党的理论刊物继续出版,直到中共“二大”以后才筹办第一个政治机关报《向导》,并于1922年9月13日在上海创刊。如果追本溯源,哪个算是红色报刊的起始呢?仅就《新青年》而言,她创办于1915年,1920年9月起改组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刊物,红色报刊是否应从此开始算起呢?随后中共上海发起组又于1920年11月创办了半公开的刊物《共产党》。在此前后,各地共产主义小组还创办了一批刊物如《劳动界》、《劳动音》和《劳动者》等。这些算不算红色报刊呢?如果算的话,那么红色报刊的起源,就又有新的说法了。“追本溯源”四个字,值得我们论坛讨论、争鸣一下。

除报刊外,人民广播的起源,赣州人民广播电台的两位同志也提出了新的看法。他们认为江西瑞金是人民广播的发源地,人民广播是1931年11月7日开始的,这一看法又把人民广播的创建日提前了9年。所以我的看法是“追本溯源”大有文章可做。

第二,发掘中国红色新闻事业的优良传统。在已经出版的中国新闻史、中国报刊史和中国广播史等的著作教材中,都在篇幅不等、不同广度和深度的层次上,对党领导的新闻事业的优良传统作了概括和总结,如本人曾把以延安广播为代表的解放区广播的优良传统概括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实事求是、严肃认真的宣传作风和联系实际、联系群众的工作方法。红色新闻事业的优良传统为新中国的新闻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近60年的新闻事业的发展证明,什么时候坚持和发扬了党的新闻事业的优良传统,什么时候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就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正确的作用和积极的影响;反之,什么时候党的新闻事业的优良传统遭到破坏,传统不传,那个时候的新闻事业也必然背离了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对社会主义新闻事业造成不良和负面的影响,例如“文革”时期。发掘传统,既要深入开掘,又要赋予新意,同时还要不断总结和概括新鲜的传统和经验。

第三,红色新闻事业的个案研究。关于红色新闻事业的研究,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有领导有组织地开展起来了,代表性成果是人大、复旦的两种教材,即《中国现代报刊史》(小册子)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闻史讲义》(打印本)。但限于当时的教学和研究条件,个集研究虽有不少成果但并不充分。新时期以来,适应新闻教育和研究蓬勃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需要,个案研究仅就我参与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闻学学科评审中,90年代以来立项的个案研究就有南



昌大学的江西苏区新闻事业研究、兰州大学的陕甘宁边区新闻史研究和安徽社科院的新四军及华中抗日根据地报刊研究三项。现在经过几年的努力探索,都已有初步成果,这次论坛就是在上述几个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召开的。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在上个世纪可以说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以方老师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为代表的一批通史式著作,其成就是举世公认、有目共睹的,下一步如何提高一步,再上一层楼,我非常同意本拟到会因身体原因未至的新加坡学者卓南生教授的建议:中青年学者要加强对断代史和个案的研究。只有在断代史和个案研究成果丰收的基础上,修改充实或重写中国新闻通史才有新的基础和可能。

第四,关于红色新闻事业的理论探究。理论的研究一般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包括史论、实务研究在内,统称理论研究;狭义的单指理论研究。我这里按广义来说。红色新闻理论的探究应包括红色新闻理论、红色新闻史和红色新闻实务等几个方面的探究。

其一,有个界定问题,即红色新闻事业的内涵是什么?日前学界和业界,仅就个人所知,一种意见认为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事业即红色新闻事业,一种意见认为除党领导下的新闻事业外,还应包括其他革命和进步的新闻事业,例如前面讲到的《新青年》,还有在党的影响下(例如外围组织办的)的革命和进步的新闻事业,例如中国记协新闻发展中心举办的“红色报刊展高校行”所包括的报刊,还有中央电视台制作播出的《纪录中国》也是从《新青年》创办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写起。这里的红色新闻事业,我理解是个比喻性界定,由此推论,深红色的是红色新闻事业,那么浅红、泛红色的新闻事业又如何界定呢?

其二,红色新闻事业史的分期问题。这个问题一般分歧不大,即参考中共党史分期即可,正如开会通知上所写。

其三,红色新闻事业在我党的新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经过延安整风和《解放日报》改版,确立了党的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为新中国的新闻事业奠定了理论基础。革命战争年代成长起来的党的新闻工作者的代表人物成为新中国中央级新闻单位的第一代领导人,如范长江、邓拓、吴冷西和梅益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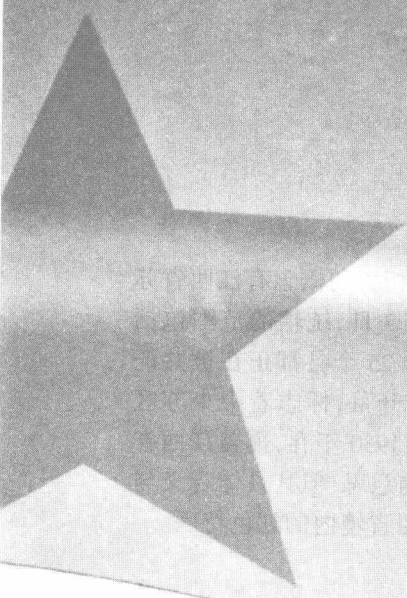
其四,红色新闻人物研究如何界定?是否以中共党员为限,非中共党员不在其内。2004年以人大新闻学院为主撰写的《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为例,可以说是一部红色新闻思想史,但却收入了终生并非共产党员的鲁迅的新闻思想研究,也收入了逝世后追认为共产党员的邹韬奋的新闻思想研究。这些都值得进一步探究。

最后想到一个问题。新中国成立前的党的新闻事业30年左右的进程中,经历了曲折发展的道路,一般来讲,1942年延安整风以后党的新闻工作的基本原则才正式确立,此前党的新闻事业在发展中多次受到“左”的或“右”的错误的干扰,所以说红色新闻事业理论研究中既有正面的历史经验需要总结,也有反面的错误教训需要清理。此外,在对建国前红色新闻事业的研究中,在“文革”前相当一段时期受“左”的错误影响甚大,好的绝对地好(对毛泽东),错的绝对地错(对陈独秀)。因此对已有的成果也还有个分析比较问题。

总之,红色新闻理论的研究既是个老课题,也是个新课题,需要老中青三代新闻教学研究人员深入探讨,集思广益,展开争鸣,不断地发展她,丰富她,为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做出新的贡献。这也是本次论坛的宗旨。

本次论坛还得到了出版时间长达10年(1937年12月—1948年6月)的红色报刊《晋察冀日报》史研究会的支持。邓拓同志的战友、90高龄的老会长陈春森同志委托他的女儿陈华同志到会祝贺,并带来了晋察冀日报画史和资料,赠送给与会同志。对此表示感谢。

谢谢大家!



第二部分

中央(江西)苏区新闻 事业研究

江西苏区标语的传播学分析^①

陈信凌

切入正题之前,需要对“江西苏区”的概念稍加限定。与它相近、相关的概念有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辖区和中央苏区。江西省苏维埃政权成立于1930年10月7日,统辖的范围包括当时江西省特定的19个红军“全占县”和6个“曾占县”,即这特定的25个县都正在被共产党和红军所控制。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31年11月7日开幕,标志着中央苏区的正式建立。中央苏区以江西瑞金为中心,其具体范围时缩时伸,至1930年春,覆盖江西省和福建省29个县。本文的“江西苏区”也涵盖时间与空间两个方面的意思,但其具体含义与二者都不同,它泛指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江西省境内的红色特区。

一、高频率大面积存在的传播介质:标语

标语作为一个词汇,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从日本引进国内的,它当时大量出现在白话的书刊里。而在日文中,标语是英文slogan、motto的意译。由此可以说,标语这个词汇转折来源于西方。但是显而易见的是,作为一种特殊的信息传播的介质、思想鼓动的载体,标语在我国早已有之。陈胜、吴广起义时便巧妙地运用了“大楚兴,陈胜王”的口号。而且更具体地说,标语在我国的历史上时隐时现,各领风骚。千余年来,不绝如缕。但是,至少是在今人的心目中,一直要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红色苏区,标语才成为一种显豁而强势的存在。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在特定的情境中,大量地制作和传播标语,使标语成为一种大面积高频率流通的传播介质。在人们的感觉中,标语与苏区以及苏区的红军密不可分,甚至成了苏区乃至红军的徽记与象征。对标语之于苏区时期的红军的特别意义,我们可以尝试从以下三个角度进行探讨。

从传播者的角度看,处于草创时期的红军,需要密集的自我宣传。

1930年1月,毛泽东在一封党内通讯中提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著名论断。应该说这是一个充满了乐观主义精神并且最终被验证了的科学推断。在这里,星星之火,喻示在苏区的红军力量比较微弱,尚处于草创时期。在草创时期是红军,又经常处于流动状态。所以,红军需要向外界密集并且高强度地描述自己和宣传自己。这样的描述与宣传,既是红军在艰难环境下自我生存的需要,也是向外扩展与延伸的必然。1929年4月5日,毛泽东以红四军前委的名义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其中说:“这时候的红军不是一个单纯打仗的东西,他的主要作用是发动群众,打仗仅是一种手段,并且打仗时间与群众工作的时间乃是一与十之比。现在的队伍,与叶贺时候的队伍大不相同,叶贺的队伍是单纯打仗的,若在现在,决不能生存。”^②从“一与十之比”中,我们可以测度出当时宣传的密集程度了。

^①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江西苏区新闻事业研究》(04BXW006)的阶段性成果。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675页。



从传播的介质来看,标语在苏区特定的环境里,展示出了明显的适应性。

红军在苏区的创建时期,大量地开展口头宣传和文字宣传。宣传队中设口头宣传股与文字宣传股,其职责是研究并指导口头与文字宣传的技巧。演讲是口头宣传的主要方式,当时要求政治部及宣传队有计划地召开群众大会,预先规定开会秩序、演说人及演说题目、时间。限于当时的环境与条件,文字宣传方面主要采用标语、布告、传单和墙报传播形式。标语是其中最普遍最常规的一种。红军时期的宣传员谭冠三曾回忆道:“红军每到一地或行军途中,凡是能写的地方,都写上标语。开始用纸张写,后来一则纸张易坏,二则行军背一大捆纸不方便,就改用墨或棕作笔,在墙上写很大的字。我们还油印小标语,凡是群众能看到,又能保存较久的地方都贴上。打下永新后,还用当地的石印机印过部分标语传单。”^①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使标语在苏区中显得更具有适应性的两个特点:第一,简易便捷,灵活实用。一个人就可以操作,而且既可以大量地油印,也可以用笔写在纸上,还可以不用笔与纸,直接以墨或棕在墙上写。第二,有一些标语不易被损毁,经得起时间的磨蚀。即使在今天,老区的一些边远山区,还能依稀看清红军时期流传下来的标语。这两个特点对于一种旨在广泛传播并且还要冲破拦阻的宣传品来说,其重要性毋庸多言。

从接受者的角度而言,标语是一种心理上容易接近或者说不易拒绝的文化读品。

标语的目标受众大致有三类,即红军将士、工农大众、白军官兵。对于红军将士与工农群众来说,可以在毫无心理障碍的前提下接纳标语。这除了标语在内容上反映他们的要求与利益外,还因为标语与民间很盛行的对联有许多的相通之处,常常也以两两对照的形式出现,有的标语干脆就是一副对联。而对白军官兵来说,他们在理智上清楚眼前的标语是一种宣传的工具,但是要做到完全不为所动并不很容易。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标语在语言上的特殊魅力所致。标语一般都出语平易,但往往是精绝醒目的事实或道理的浓缩。因而具有特殊的渗透力与鼓动性。

二、一种特殊的组织传播类型

所谓组织传播,简言之,就是组织为了应对环境的不确定性或者为了实现已经设定的愿景与目标而进行的信息交流活动。在这里,组织是信息传播的主体。一般都认为,组织是“一个通过协调活动来达到个人和集体目标的一个社会集合体”^②。一个社会集合体是否属于组织,关键看它是否拥有一个统一的指挥或管理系统,凡是具备一个规范而严密的管理系统的集合体,如政党、军队、政府机构、企业、社团等,都属于组织的范畴。但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关于组织传播甚至是组织的研究,大多是以企业为案例或者对象的。关于组织传播的描述与结论,也基本上是由此抽绎和推导出来的。事实上,在苏区中的红色标语的制作、流传,由于是在特殊的环境有限的条件下进行的,是一种更典型的组织传播的案例,或者说是组织传播的一种特例,它体现出了组织传播更浓厚、并且还并不为我们所熟知的一些征象。

第一,标语传播的重要性异乎寻常。具体来说,它与组织的生存、壮大与发展息息相关。

为了应对国民党军队向苏区展开的第一次大规模“围剿”,组织群众积极对敌开展宣传,瓦解白军斗志,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于1930年11月10日发布了《宣传动员令》,要求大家都

^① 见井冈山博物馆提供的《访谭冠三老同志记录》。

^② 【美】凯瑟琳·米勒著,袁军等译:《组织传播》,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1页。



拿起笔来,写下给定的十二个针对白军士兵的标语口号。该命令言及标语宣传的重要性,特别强调说:“我们拿下面那十二个口号作武器,我们要坚决相信那十二个口号的力量,每一个抵得红军一军,我们提出那十二个口号,就立即增加了十二军红军的力量。”^①

在具体战役中进行有针对性的宣传,其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对包括标语传播在内的宣传工作异乎寻常的重视,共产党人是基于对红军的性质与任务的清醒认识前提下做出的选择,而绝对不仅仅是因为在大敌当前下的特殊要求。1929年12月28日,中共红四军“九大”在上杭县古田召开,史称“古田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八个决议案,其中涉及到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强调指出:“中国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他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外,还要负责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的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②

在江西苏区,不仅是党和红军的领袖对包括标语传播在内的宣传工作的非常重视,地方的党组织也是如此。1929年3月中旬,彭德怀率红五军占领了安远县城。中共安远县委派杜隆奎入城向彭德怀汇报县里的工作。彭德怀了解到县委活动经费困难,全靠砍柴烧碳维持生活,便拨出现洋200元和一些缴获的烟土给县委做活动经费。杜隆奎退回了银元,留下了烟土。他说:我们砍柴烧碳可以维持生活,银元退回红军做军费,烟土我们收下,变卖后买一台油印机印刷宣传品。^③后来,彭德怀在湘赣、湘鄂赣苏区几次表扬安远县委的这一举动。

第二,标语的传播队伍的构成与运转既有层次又有协作,传播的职责、路径有周详的设计。充分显示了组织传播的严密、规范的一面。

标语的主要传播者是红军各个宣传队的宣传员。“古田会议”通过的决议案要求,军及纵队直属队均各成一单位,每单位组织一个宣传中队,其中正副队长两人,宣传员十六人,挑夫一人,公差二人。每个中队的宣传员又分为若干分队,每个分队有分队长一人,宣传员三人。各支队宣传队受支队政治委员指挥,各大队分开游击时,每大队应派去一个宣传分队随同工作,受大队政治委员指挥;直属队宣传队受政治部宣传科长指挥;全纵队宣传队受纵队政治部宣传科指挥;全军宣传队受军政治部宣传科指挥。宣传员的来源有两条,一是直接在各部队中挑选优秀分子,一是由地方政府选派的进步人员,当然他们要先参加红军。政治部要经常对宣传队进行培训,以提高宣传员的工作成效。

1930年4月16日,红四军政治部在江西会昌县发布了《宣传员工作纲要》。其中规定:宣传队应指定专人背负所有宣传品及糇糊筒,每位宣传员则必须备好一副写标语的用具,用白或黑的颜料,将本部规定的各种标语,随时随地写于行人容易见到的墙壁上。并且,“根据本部规定的标语本子,除每个都要在墙壁上书写外,字数较多的标语得用有色纸写好,张贴于通衢大道行人易见之处”。此外,“每到一个城市,要用红布写上本部规定之主要标语悬挂于街道中间”^④。由此可以看出,标语的传播实际上已经有一整套相沿成习的规程。

① 曾庆圭:《历史的足迹》,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135页。

②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85页。

③ 余伯流 凌步机:《中央苏区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87页。

④ 曾庆圭:《历史的足迹》,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127页。